政治科學論叢／第 97 期／民國 112 年 9 月／頁 1-40

郭嵩燾的政治思想*

詹　康**

摘　要

郭嵩燾認爲一位聖君或一位賢相的統治雖好，不如公天下之既好而又長久。他觀察古今中外的政制，以印證他的思想。所謂公天下，在中國是讓更多的官員一起討論國政，與增闢地方紳士影響地方行政的管道，在西方君主國則是將國政交給選舉出身的紳士與世襲貴族來決定。

然而公天下與一人獨擅的差別，並不解釋西方國家與中國在治理上的優劣不同。不論是一君、一相、一督、一撫，還是眾官、眾紳，他們是否務爲學問，考求實際，不虛驕自矜，才是治理良好與否的原因所在。

對事理的不同態度，形成一國之善氣惡氣，而又與天地之氣通爲一體。乾隆以後中國由盛而衰，西洋後來居上，發生於同時，便是人感應氣而氣在東西方發生了轉移。

郭嵩燾活在惡氣當令的中國，選擇晚年致仕，在長沙組織地方社團，從一隅改變人心。謗滿天下的他，只有以私人力量在民間慢慢做起，冀以三百年後中國風俗變換一新。

關鍵詞：政治思想、晚清、洋務運動、自強運動

* DOI:10.6166/TJPS.202309_(97).0001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E-mail: kangchan@nccu.edu.tw。
收稿日期：111 年 10 月 4 日；通過日期：111 年 12 月 6 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郭嵩燾生於清代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卒於光緒十七年（1891 年），年七十四。他生經嘉道咸同光五朝，與曾國藩義結金蘭，躬歷鴉片戰爭浙江戰場，勸左宗棠出山成其功業，統兵殺敵守城，在南書房看書畫精品，協助僧格林沁在天津防海，巡撫廣東，掌教長沙城南書院，成爲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興辦講舍與會社以移轉民風，有當時士大夫所無的經歷，也有時人所無的獨見。

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傳統的觀念與架構運用到開始變化了的中國，再運用到歐西政治。解釋印證的材料增加到了史無其先，而不變其觀念與架構，所以他因緣際會，是天主教撤出中國後，極早融冶中國與歐西於一爐之人。下面第二節敘述他政治思想的觀念與架構，第三、四節敘述他對中國政治的看法，第五節是他對英法政治的看法，第六節是他以心態爲本原的思想，第七節探討他對政體的觀念，第八節是結論。以生平階段來說，第三、四節關於 1847～1876 年，第五節關於 1877～1878 年（出使英法），第六節關於 1878～1891 年，第七節跨全部生平。

貳、郭嵩燾政治思想的觀念與架構

史華慈提出東亞文明的特殊處，是政治佔了文明中的首要地位，具有最大能量感格天地左右萬物，這種思想不見於其他古老文明（Schwartz, 1996: 114-120）。對此觀察，我們可以舉董仲舒天人三策做爲典型的例證，他說一切隨人君的居心而轉動，人君的心正，就可令朝廷正，隨後百官、萬民、四夷依次而正，接著自然力量與生長秩序亦順暢運行，終致祥瑞畢至，是爲王道的完成：

> 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漢書・董仲舒傳》，班固，1986：2502-2503)

這個論述以人文領域足以左右自然領域，道德直貫氣運。君主是階層化社會、宇宙的基點，所以人文與自然的一切實隨君主而轉動。氣是貫通解釋的概念，所謂人文領域的「正」意謂正氣充滿，沒有邪氣作怪，而自然領域的秩序也得自於陰陽的調和。

郭嵩燾政治思想的架構原則就是史華慈的說法，且氣論又佔重要席位，以下分爲幾層來敘述。首先，人文領域之「正」來自於國家的統治，朝廷正則天下人自正，這和董仲舒之語極相仿：

> 朝廷者天下之本，朝廷正則天下自正。(11：365 光緒七年三月廿六日日記)[1]

> 天下治亂之原，全在吏治，而其根本則在朝廷。有一分實用，即有一分效驗，非可以文飾爲也。(11：291 光緒六年八月二日日記)

核心在於皇帝，故治理的本原在皇帝的誠心。皇帝致其誠，則聚集和氣，招來濟濟之賢士，共成一國之治；不致其誠，則下民哀怨，聚集乖氣（8：380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日記）。和氣勝乖氣，即舉君子遠小人，兩者互爲表裏，所以他說：「爲政當急正君子小人之辨，此治亂之源，政之本也。」（8：389-390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七日日記）

皇帝而下，郭嵩燾又看重當國大臣，也就是軍機大臣，特別是首席軍機大臣。這些權位足以移轉天下人心風俗，所以居此位者需有強烈的意志，處於邪氛卻屹立不搖，進而發揮抑惡導善的作用：

> 推之而一縣得一守令，推而之一省得一督撫，推而之天下得一二執政大臣，是非明，萬事理矣。(8：480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日記，另參 11：175 光緒五年九月六日日記)

正氣邪氣各有別稱，前者有順氣、通氣、善氣，後者有戾氣、囂氣、沴氣、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1] 本文引用郭嵩燾（2012）著作，全據 2012 年版《郭嵩燾全集》，出註時逕以「冊號、冒號、頁碼」表示，並附及篇名或日記日期。

逆氣等。軍機大臣養氣，可以致天下之氣於善於惡：

> 天下之囂氣靖而後天下之正氣昌，能知此者難矣。此當國大臣之事也。氣之囂也，氣之靡也，一動而囂然，一反而靡然矣。大臣養吾氣以致天下之氣，忠孝廉節之道其常，言論事功之標其準，而何有囂哉。(8：424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二日日記)

郭嵩燾因論擇相的重要（8：424-425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二日、頁 483 同年十一月廿五日、9：223 同治五年六月廿二日日記），擇相是君主之權責，雖然每日軍國大政亦取決於君主，然而匯整資訊、呈上建議，是最高大臣極吃重的功能，所以他仍著重君主對最高大臣的選任，而選任之明來自於君主先能正己：

> 轉移天下之人才者大臣；任大臣以持刑賞之公，進退人才者，君也。……正己以正物者，舉措一二人而天下景從。(8：493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

君主處於政治結構的重心，治亂之源即在其身，其身正其心公，則人文與自然領域必亦隨之轉移。郭嵩燾第二次與咸豐帝召對，便將皇上與上天繫屬重疊，皇上之心即天心在地上之所見端，於是皇上欲治，則天意也就欲治：

> 上曰：「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轉機否？」曰：「皇上，天也。皇上之心，即天心所見端。皇上誠能遇事認眞，挽回天意，天心亦即隨皇上以爲轉移。」(8：170-171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記)

一月後他上了生平第二疏〈謹推陳致治之原疏〉，內容包括他主要的政治思想，上述召對語便寫在最前面：

> 皇上，天也。皇上以挽回世運爲心，政事日修，人才日出，天心未有不隨以轉移者。(4：3 咸豐九年正月廿四日〈謹推陳致治之原疏〉)

所謂天、天心是代言氣運，這裏牽涉到人定勝天、天定勝人之說，下面會解釋。

其次是人才的任用與官員能否發揮效用。上面看到善惡的源頭在君主和軍機大臣，他們正心與正身，對於中央與地方各級官員就會任用人才，

臺灣期刊資料庫

國家治理也就走上正道。反之則任用小人，而治理日非。又由於人之善惡與氣之善惡爲表裏，所以治世的君子會影響出好的氣運，衰世的小人會影響出壞的氣運，而兩種氣運又分別臂助君子小人各行其善惡之志，這也就是說，治世君子必能抑扼小人，而衰世小人也必能擠陷君子。這就是人與天地參的眞正意義，即人司轉移天地之權，君子欲治而小人欲亂，而天地從之，這是人定勝天。待治亂之局成，或小人鬱抑難伸，或君子橫遭荼害，則是天定勝人：

> 國家盛時，所進用必君子，所黜必小人。君子得氣之運，有所恃以泰然行其志，而小人退聽焉。
>
> 及其衰亂，所進用必小人，所黜必君子。小人得氣之運，亦有所恃以泰然行其志；而君子退聽焉。人相趨於苦惡，天地亦但能授其權於人，而不能自直其好惡。其究也，馴至大亂，則並天下之賢不肖而草剃禽殲之，天之氣乃獲一申。
>
> 下而一鄉之中，其俗良，其人善，則一鄉之風俗淳，而賢者常享富貴以行其仁焉。一鄉之中，其俗詭變而奸猾，其人兇狠而貪戾，則一鄉之風俗薄，而不肖者常享富貴以行其暴焉。
>
> 非天之好惡殊也。人參天而立以司其權，天地亦不能不隨以轉移。語所謂人定勝天，誠有以勝之也。世俗但謂人可以斡旋天地。斡旋者，人也；爲治爲亂以待斡旋之人者，天也。則仍天定勝人之說也。《書》〔《尚書・泰誓上》〕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其必從者，天之機也。聖人〔謂君主〕在上而民從之，以與天地準，是謂天地之大順。（9：401-402 同治九年正月十六日日記）

人分君子小人，氣亦分陰陽，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氣之運行無形，需藉人之事功而可言可表。二氣之消長，始於一人，然後感應至眾人，造成家國天下之盛衰（8：126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日記）。言氣運，即言其力廣大無不包，裹億萬人而旋轉之，使其同遭禍福。當衰亂之世，君子遭禍不僅是小人爲之，亦是天所樂之，蓋逆氣如此，此即天定勝人之說。然衰亂之世亦非一味衰亂，賢人豪傑振起一時，偶亦見之，不過這只是運勢下降中間暫時拉回一點，宛若天意對他們讓步，其實要從長程來看，「遲久而後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一世是爲治世或是爲衰世（8：128 咸豐八年八月廿七日日記）。賢人君子受到壞人侵凌而不得伸張，亦是天因末世之人心而助其勢，君子蒙冤而無告矣（11：334 光緒六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記），甚而令善人速死，以成天下不治之局（9：519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七日日記）。

第三，既然人文領域的氣與自然領域的氣是同一箇，則後者所在皆有善惡的徵驗。郭嵩燾對於天氣的失節、天然的災害，都聯想到是人文領域道德衰蔽有以致之。像苦旱是因爲督撫抵牾以致「天心感召」（9：131 同治四年六月廿九日日記），過份的熱是「吏道不修」（9：539 同治十一年七月廿六日日記，另參同冊頁 476 同治十年四月廿二日日記），過多的水是因「朝政昏暗，吏道闟冗」（9：582 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日記，另參 12：107 光緒十一年五月廿七日日記），乃至於貓狗不佳（買不到能捕鼠的貓）、家畜多斃、鼠鼷橫行、蠶與蜜蜂不旺、松樹與蔬菜生蟲等，都和湖南一地治理不善、種下動亂之因有關（9：340-341 同治七年八月十七日日記）。小至於書蠹肆虐，大舉吃掉他的書，也是湖南省官民道德敗壞，結爲天地間的戾氣，滋生小蠹蟲。他從惋惜自己藏書，到擔憂湖南省的未來（12：116 光緒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日記）。

他自英、法歸來，最後十三年居於長沙、湘陰，常常議論天候之乍雨乍晴、過熱過寒、冷熱反常，與中土人心百變，變詐多端相一致，這是天人合一之理。[2] 和出使英、法三年時光相比，發現外國無之：

> 是日稍見日，而鬱熱至不可耐。申刻雨，稍涼。移時更作鬱熱，入夜尤甚。嘗論天人感應之理，此最爲明徵。中土人心乍水乍火，乍寒乍熱，反覆百變，不可測量，天氣遂亦隨人心以同歸於不可測量。凡此皆非天也，人也。海外三年，無此天也。[3]

他見到歐西國家優於中國，政教佳風俗美，連氣候都守規矩。

2　11：68 光緒五年三月初二日、頁 108 光緒五年四月初五日、頁 186 光緒五年十月初五日、頁 245 光緒六年三月初四日、頁 487 光緒八年五月十六日、頁 578 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12：154 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頁 173-174 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日、頁 192 光緒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日記。

3　12：244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十五日日記，類似專斥中國之文，還有頁 245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廿四日、頁 311 光緒十四年四月廿三日、頁 314 光緒十四年五月初七日日記。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四，政治佔首位，還意味把神鬼納入政治體系的轄內，鬼神需受官府之封，才得到認可。郭嵩燾便認爲官員受到鬼神的護衛，然而兩江總督馬新貽輕易爲平民刺死，表示鬼神開始看輕清朝官員了（9：437 同治九年八月十七日日記）。湖南巡撫出城巡閱部隊，久雨爲之放晴，可能是鬼神爲巡撫效勞（9：545 同治十一年九月廿五日日記）。更有趣的是他作夢，一伽藍神謝謝他出力使他補得此職，因爲在天庭出任官職需要地上政府爲死者恤贈，恤贈就是天上的任官資格。伽藍神說「皇上爲天下主」，所以天上官職也在皇上的權力下，即使皇上拜佛祖，佛祖也要下蓮花座答拜，不能高坐受禮（9：456 同治九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記）。

至於郭嵩燾本人的宗教信念，是相信鬼神造成他的疾病與取走他子女性命的（9：401 同治九年正月十六日日記），本人與家人生病亦用宗教儀式與療法。

以上四層意義，分別是君主與軍機大臣居於斡旋乾坤的樞紐，他們選任的人才釀成好或壞的氣運，壞的氣運會影響氣候異常與自然災害，以及仙鬼受到人類職官的管轄。這些是郭嵩燾政治思想的主要架構，下面我們來看他怎麼以這主要架構來講評實際的政治。但在轉入下節之前，關於氣運還有一事需要申述與分辨。

我後文會提出，郭嵩燾對氣運概念還有一個重要用途，是描述、解釋中國、西方的格局變化。事實上，這乃是十九世紀官紳士民面臨千古未有之變局，苦思以理解之之時，傳統思想賦予他們的一種無法否證的超現實大解釋，不獨郭嵩燾爲然。王爾敏將 1840～1900 年的六十年稱爲「醞釀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過渡時代」，並細分爲四階段：1840～1860、1860～1880、1880～1895、1985～1900 年。屬於第一階段的魏源和徐繼畬，已經採用運會、天數、氣數概念與幾種方位、運轉理論，來理解西方的興起與中國之喪失優勢。到第二階段，則凡卓有見識的知識分子，無不侃侃言之，王爾敏舉例者，有王韜、薛福成、郭嵩燾、曾紀澤、曹秉哲、丁寶楨等人（2003：1、10-11、343-353）。因此，郭嵩燾生在這樣的言論環境中，一定受到影響才嫻熟這種理論。

但是思想發生的途徑和思想建構的邏輯不同，從後者來說，描述、解釋中西格局變化只是最終的功能，在達成此最終功能之前，勢必要分頭舉

臺灣期刊資料庫

證中國的氣運是如何的衰減了，而西洋又是如何的上升了。而光是舉證並不能滿足人追根究底的心理，所以又勢必尋求源頭，這在郭嵩燾的情形，就是檢討政治菁英的責任。然而他之所以做此想，又是由於受傳統思想所籠罩，相信人文與自然領域都是層級的結構，而峰頂是君主。這樣看來，王爾敏做的是描述時代思潮，不是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體系，所以毋須潛到水底，察看冰山之下的冰體。本文則按邏輯先後順序，由本節提出郭嵩燾政治思想的觀念與架構，下三節看他的經驗舉證與歸因，嗣後兩節看他嘗試轉變氣運的做法，與他設下的限度，如此方才本末兼備，綱舉則目張。

參、清代的治亂（一）：中央

郭嵩燾認爲清代政治的衰敗，始於道光之世，原因是道光帝駕馭大臣失之於縱容，此後晉升高位者沒有足夠的才幹與良好的德操，所以政事與吏治每下愈況。

一、嘉慶以前

郭嵩燾說，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改變明代的政制，親持政柄。朝廷重臣推敲法律，合諸情勢，以制定法例，由六部執行法律與法例，行之天下，結果既有守法之美，又不泥守法條而失事理之宜。道光帝不然，拱手退聽，所任之軍機大臣不足以當治國之重任，六部又自行掌管其職務，於是權柄落入各部書吏之手。人才不出，國政日隳，天下終至敗壞不可支：

> 自聖祖、世宗、高宗，皆以聖人之資，乾綱獨攬，群臣拱命〔「手」誤〕聽命以供奔走，政府〔內閣〕不足以持天下之權。故自明以來，以六部控制天下，其後閣臣又足以控制六部。本朝則一由人君操其柄，六部守成法以繩天下，朝廷準情達變，發明例意，推求六部之失以繩大臣。是以諸臣奉法惟謹，而不敢不探求事理之宜，以求制法之中。自道光後，則一委其權於六部，而人君拱手退聽焉。又不求天下擇人，以天下之大權付之一二闒茸無能之俗吏〔指軍機大臣〕，使部書〔書吏〕得以倒持其柄。國正〔「政」誤〕日隳，人才日靡，終至敗壞而不可支。（9：609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

臺大經濟期刊資料庫

嘉慶帝用人不疑，不務於偵知細故以進退大臣與主帥，有嘉慶十八年那彥成清剿河南天理教李文成的故事爲例：

> 會有旨，遣侍衛八人詣軍。相國〔那彥成〕檄留之他縣，約曰：「有差遣，當召以來。」已而逾月無差使，八人者馳書問故，相國書其後曰：「軍中無事，且可高臥。」侍衛因據以入告，仁廟亦不問也。當時大帥氣識如此，朝廷亦倚重之，不撓其權，非復今所能及也。（8：305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八日日記）

他記錄這些故事，都有感時諷喻之意，下面會立即看到。

二、道光

上文說到郭嵩燾記載道光帝拱手退聽，與前幾位皇帝之主動領導不同。按：委任責成本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政治思想，道光帝之消極不領導非必爲缺點。可是道光帝對官員寬仁，不以法律繩之，又自安於官員無遭舉發過惡者，遂致官員互相掩蔽過失，與潤飾其功，這便開啓官員作僞與犯法之風：

> 因論及本朝朝局，至宣宗一大變。以恭儉仁慈之聖人，卒以致天下之亂，其大端有三。列聖所以致治無他，治官以嚴，治百姓以寬。至道光時乃一意寬假在位者，其視律令之頒，但以施之百姓而已。吏治日偷，紀綱大壞，相與因循粉飾，苟愉旦夕。其弊一也。
>
> 世宗所以訓戒其臣工，每曰：「人非聖賢，豈能無過，貴在能改而已。有過不妨直告，吾不責有過，而惟責夫文過遂非者。」至道光時，但苟幸官吏之失無有舉發者，以相爲掩蔽，潤色鴻業。作僞愈工，吏治愈弛。其弊二也。（9：608-609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

有一則故事說明了道光帝對大臣的寬仁，他明知兩江總督璧昌糊塗不能辦事，而不撤換（8：141-142 咸豐八年九月廿八日日記）。職位畀以無能者，則人才晉用無門，人民不得善治，清朝由盛轉衰之機便在道光朝，郭嵩燾將乾嘉與道光對比者頗多，[4] 對道光朝治理的總評曰：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4] 如 9：209 同治五年四月廿五日、10：31 光緒二年五月十五日、11：109 光緒五年四月初九日、同冊頁 184 同年九月廿八日日記。

> 道光之季，上而紀綱法度，下而風俗人心，流極敗壞，莫可窮詰（10：130 光緒五年五月十八日日記）。

吏治不修，終於釀成太平天國之大亂。

三、咸豐

咸豐始政，有賽尚阿、祁寯藻、杜受田三賢佐，至咸豐四年三人或死、或罷、或老病致仕，「而善種盡矣」。此年僧格林沁擊敗太平天國北伐軍，繼而曾國藩再克武昌，然而太平天國軍勢仍強，各省民亂與外國通商傳教糾紛日多，竟無治平之期，大傷咸豐帝勤政之心，開始相信氣數之說（8：147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日記）。

咸豐帝懷疑人的努力抵不過氣數，使他目光轉向今語所謂「福將」，予之高官厚祿，冀藉其福運以平定動亂、平息外夷，而不考究其人之賢否。至於眞正的賢才，帝雖有聞見，也猶豫再三，終不重用，久後亦忘其人。朝廷重臣之用人亦同樣不問是非，即便任用的人大家都知道不好，大家也無可如何，而大家都知道的好人不獲任用，大家也無可如何。向他們建議，他們也不爲所動。這樣子人才愈來愈少，天時與人事吻合，一致傾於衰敗（8：123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日記）。所以郭嵩燾說，咸豐帝懷疑、不信任人，而薄視士大夫，已經很久了（8：375 咸豐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記，致吳大廷〔字桐雲〕信）。皇帝如此，形成一國風氣，上至君臣之相與，下至朋友之相接，都一味成人之惡，同心一德並趨於惡：

> 數十年來，朝廷以及天下，君臣之相與，朋友之相接，只一昧成人之惡。如朝廷一政之美，一念之善，左右大臣不知導揚也，又從而沮遏之。其過舉妄念之動，無一不將迎附會，使成乎惡而後已。屬吏之於督撫亦然。反覆求其故，不可得。……天下之營私趨利以成乎風俗，上而朝廷，下而朋友，相與同心一德，並趨乎惡而相習爲固然。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亦可以審所處矣。（8:434-435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九日日記）

「反覆求其故，不可得」說得含蓄，實則我們見到他以氣理論解釋一世的善惡。道光帝啓動清朝由盛轉衰，咸豐帝前四年振衰起弊，厥後未能維持，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遭際之厄使然，咸豐帝喪失求治之心，且重臣中無善人，結果是人才不能見用，人民漸流於惡。待其勢已成，未來同治、光緒兩朝，便朝衰亂的方向穩定發展，無能逆轉。咸豐帝崩殂後，他總結咸豐朝是當政之人不任用人才而任用鄙夫，以致誤君誤國：

> 朝廷以忘有所爲者爲厲禁，而使鄙夫充位，相與樂禍以偷安。乃以恭儉仁慈之君，釀成天下之亂，豈不哀哉。（8：483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日記）

咸豐帝是他所侍的第一個皇帝，由於英法聯軍之役，眾口呶呶主戰，當局者與防守天津的僧格林沁不用他與洋人和平商談之建議，以致首都失陷，皇帝逃往熱河，死於熱河，他深爲感傷憤慨。

郭嵩燾對個別軍機大臣並無指名評論，而對戶部尚書肅順論之獨多。《清史稿》說：「肅順恃恩眷，其兄鄭親王端華及怡親王載垣相爲附和，擠排異己，廷臣咸側目。」（趙爾巽等，1981：11699，卷 387）又說：「大學士祁寯藻、翁心存皆因與意見不合，齮齕不安於位而去，心存且幾被重罪。」咸豐帝幸熱河，「事多出肅順所贊畫」，簽訂北京條約後，「留京王大臣籲請回鑾，肅順謂敵情叵測，力阻而罷」（趙爾巽等，1981：頁 11700，卷 387），可見肅順權勢之大，皇帝信任之專。肅順喜歡延攬人才，郭嵩燾是他看中的人（出處同前），但郭嵩燾並不與之太過親近，且在咸豐十年三月乞病求去。他日記對肅順只有批評而無讚美，先是轉述一個伶人評肅順等人「勢焰薰人」（8：111 咸豐八年七月初十日日記）。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帝崩，肅順爲顧命八大臣之一，整頓積弊，務爲治國，然而郭嵩燾批評其不知體要、不用賢能，尚權謀而至誠惻怛或不足，預言治理將愈亂（8：466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日記）。及聞政變，肅順伏誅，他云肅順「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取禍之道。[5] 他之引退歸里，不僅使他避開北方戰亂，而且未受政變後之整肅波及，可云有識人之智矣。

臺灣期刊學術期刊資料庫

[5] 8：492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黎澤濟（1988，無頁碼）參考了《郭嵩燾日記》但未考察日記中對肅順的評語，因而認爲郭嵩燾對肅順欣賞與惋惜。

四、同治

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政變，四十天後郭嵩燾從湖南巡撫毛鴻賓得知此事，日記評論說，顧命八大臣中爲首的怡親王戴垣、鄭親王端華是平庸人，因緣際會而得執國柄，與軍機大臣一樣皆中下之才，無力治國。又評論新統治班子爲首兩人，恭親王奕訢（時年廿九歲）經驗不足，首席軍機大臣桂良尚還不如遭撤換者，所以對未來國運未可逕爲樂觀（8：476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日日記）。

新人上臺後有許多新作爲，他在上日日記兩個多月後，寫下對新政的正面評價，不過他只肯定恭親王奕訢「才識曠越一時」，而認爲軍機處仍然無人（8：508 同治元年正月廿八日日記）。

數月之後他二度爲官，由蘇松糧儲道而南淮鹽運使，再署理廣東巡撫，對政治又有親身認識。同治四年供職廣東期間，恭親王奕訢曾從權力高峰跌落，遭免去一切差使，他聞知後並無惋惜，云恭親王柄政三年多，評價不佳，「聲名日隳有以自取之」（9：81 同治四年四月五日日記）。這個波折只持續十天，恭親王恢復原職，參劾的蔡壽祺遭革職，潦倒餘生。恭親王在他後來的評價中一直正負參半，下面還會看到。

同治初年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積極求治，的確局面一新，收到實效，改變道光以來朝廷「賢否舉措，犁然有當人心者蓋寡」的惡績，「實六十年來所僅見者」。然而同治三年六月收復江南，諸將論功行賞，祭告咸豐帝，便有御史建議收回朝廷大權，諂諛君主，以養其驕。內之文官，外之將領與地方官，以引惹朝廷猜忌爲戒，任事之心遂隳，唯求苟安保祿而已（11：84 光緒五年三月廿七日日記）。太后與朝廷收回大權，加緊節度，與嘉慶帝一由將領自主，不與聞軍營細事，二者爲天淵之別，一盛一衰，在此可見。

待太平天國、捻匪與各地民亂漸次平定，中樞任用官員便不再以才能爲尚了。同治末年，「京師局面，一循道光末年之風氣，而相獎爲無用」（9：580 同治十二年六月八日日記），「近年當國大臣，急修宣宗之政，以自護其私而匿其短」（9：609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棄人才不用，上至垂簾聽政的太后亦然。慈禧太后喜歡督撫相貌魁梧、長髯滿面，郭嵩燾從好的方面說，至少比任用八旗滿人好，但那當然不是鑑別人才的正確方法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9：563 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日記）。所以他比之於道光之政，就如道光帝任用璧昌爲兩江總督一樣，是朝廷諸公不能影響的，乃是「天」爲之。

五、光緒

同治朝的洋務運動繼續推行至光緒朝，中樞主持者恭親王奕訢得到兩宮太后支持，乃能行之，可是朝野多數士大夫仍相信中國優越，不贊成仿效西洋，形成強大的掣肘力量，混亂兩宮的視聽，兩宮兼聽正反意見，未必支持恭親王，以致尊貴而有權如恭親王者亦不能落實洋務，督撫在各地興辦洋務，所遇挫折亦同。郭嵩燾說，兩宮在政事得失上是傾聽的角色，大小事交付軍機大臣主持，未嘗自主。恭親王辦洋務，受到攻訐的聲浪很大，「苦不能任事」，結果常受挫敗。郭嵩燾能爲兩宮和恭親王說好話，然而英國駐華公使批評「政府無人」，他便不能反駁了（10：417 光緒四年正月廿九日日記）。明清的「政府」指內閣，當時軍機大臣不皆贊成洋務，權力核心的思想不統一，恭親王自難凡事盡如己意。「聖躬沖齡，政在大臣，瞻顧尤多」（13：370〈復姚彥嘉〉，光緒五年四月），所以抵銷了洋務派做事的力量。

他對恭親王和政府之人品才識，評價皆低。關於恭親王，他記錄了曾國荃的評語，云嫉才、不誠無物、無本（11：373 光緒七年四月廿四日日記）。又記錄劉坤一轉述翁同龢的評語，云中不足、有私（11：461 光緒八年二月初七日日記）。有私，則爲了保持祿位，攫取利益，而願意妥協，不堅持理念，這樣自無善政。恭親王之私心，不得不說也是政壇造成的。他的弟弟醇親王奕譞是他政壇大敵，「醇邸志在傾恭邸以撓其權」（9：475 同治十年四月廿一日日記），所以他也要保護權位、爭奪權力，與政敵互相箝制，與拉攏保守派、主戰派，從而稀釋了改革的理想。

軍機大臣中唯一令他尊敬的是文祥（13：242 光緒元年五月〈致沈葆禎〉）。他認爲將他由福建調入京師，協助辦理雲南教案與英人交涉的就是文祥（10：3 光緒元年正月十一日日記）。文祥在光緒二年五月病卒，郭廷以說：「靠著秉性與機敏在宮廷中贏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親王的處境進一步惡化（1985：547）。」此外的軍機大臣則無一善類，他記錄京師對光緒六年恭親王以下四名軍機大臣的清議：兵部尚書沈桂芬陰險，武英殿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大學士寶鋆貪鄙，戶部尚書景廉有寶鋆之貪鄙而無其爽快，戶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王文韶有沈桂芬之陰險又不及其清廉（11：238 光緒六年二月十六日日記）。此即前語「政府無人」之眞相註解。繼文祥之後主掌總理衙門的李鴻藻，尤爲他所厭惡。

中法越南戰爭打至光緒十年三月，慈禧太后撤換所有軍機大臣，改由禮親王世鐸領導軍機處。這是主戰派壓倒主和派的結果，以貝勒奕劻領導總理衙門令他覺得「尤使人茫然莫喻其義」（12：21 光緒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記）。他認知到政府眞正掌權者是醇親王奕譞，「樞臣備員而已」（12：80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日記）。奕譞是咸豐帝與奕訢之弟，慈禧太后爲其皇嫂，其嫡福晉爲太后妹（兄弟娶姐妹），二人所生的長子早夭，次子載湉爲光緒帝，他與側福晉生子載灃，載灃長子溥儀後爲宣統帝。他與皇室的血緣關係遠遠親過禮親王，禮親王遠祖是努爾哈赤次子、皇太極之兄。他曾評論醇親王「氣質尤粗」，不如恭親王遠甚（9：475 同治十年四月廿一日日記）。以此政事更非，不堪聞問。

上驕下諂、虛僞粉飾，久已成爲政治現實。君上無不想求治，如有某些心態不良，責在大臣匡正。現實卻是大臣朝錯誤的方向施政，報告君上他們做出了成效，其實誤國殃民，所以他嘆謂本朝有君道而無臣道：

> 大率內外臣工相率以欺罔朝廷爲事，二百餘年積成此風習，相視爲固然。嘗論明之季世，無君道而有臣道。本朝季世，君道未若明世之失德，而臣道之亡久矣，無智愚賢不肖，統歸一欺字，鬻國病民，所不顧也。（12：42 光緒十年七月初一日日記，類似的話又見頁 44 本月十八日日記）

各級官員以禍國殃民的作爲共同欺罔君上，結成一個罪惡的群體，這個群體有內在的凝聚力量，金錢贈與是其中之一。他批評貴州巡撫岑毓英時，指出了「多金酬應」這一點（11：435 光緒七年十月廿六日日記）。道光帝容許中下之才在位，然而他還明知人才之賢否，後來的皇帝和太后則受謊言包圍，中下之才互相稱讚爲賢才，又一同排擠賢才。他的結論是人才愈來愈少，有待重新培養。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清代的治亂（二）：省

官吏治理人民，稱爲吏治，這是郭嵩燾非常關心的項目。咸豐帝當太平天國與捻匪等亂事，問他治理要從何處下手，他對說：「仍當以講求吏治爲本。」（8：171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記）在此之前，他已斷言自古以來，天下人所受冤曲來自於官吏未繕修其職，人民冤苦累積後，戾氣乘之以肆虐（8：60 咸豐六年三月廿日日記）。這是與曾國藩、左宗棠、羅澤南、劉蓉、王鑫共同的見解。[6]

清代最高地方長官爲總督與巡撫，郭嵩燾從 30 歲成進士至 74 歲去世，家居湖南計二十九年（30～36、39～40、43～45、49～57、62～74 歲），目睹湖南吏治之敗壞，寫下許多見聞與評論。吏治應考求的項目很多，本節只論述與治亂之幾最有關係的三個：最高長官、奸民、紳士。

一、最高長官

湖南省的最高長官是湖南巡撫，對吏治負有絕對責任。郭嵩燾是名紳，歷任巡撫皆與其交往，他對各巡撫的記述比對其他地方官員多而完整，所以從他這方面的文字可以得出他對人才的看法。湖南吏治由善至不善的轉變點，在同治六年劉崑之時。

前文看到咸豐元年至四年的朝廷中樞有良臣賢佐，所以政治有起色。此時的兩位湖南巡撫駱秉章和張亮基，正是郭嵩燾評價最好的。咸豐二年太平軍從廣西過湖南而東，七至十月圍長沙不下，是張亮基守城的，當時左宗棠從他之勸，從外入圍城襄佐，是其功業之始。湘軍之建立則在潘鐸與駱秉章任內，潘鐸時間短，駱秉章的功勳甚大，他採用郭嵩燾的辦法，向全省商人開徵釐捐，湘軍軍餉乃有穩定來源。

---

6 參張晨怡（2007：147-148）。曾國藩另曾提出湖南致亂之由在於貧人太多，郭嵩燾批評爲俗儒之論（9：464 同治十年二月初九日日記）。以貧爲社會疾病之因的見解，亦見於郭嵩燾錄蔣予檢（字矩亭）詩：「我更爲君進一解，方今瘡痍遍寰海。第一大病患在貧，俞跗巫彭不能待。」（8：86 咸豐六年七月初四日日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後爲翟誥、文格、毛鴻賓、惲世臨、石贊清、李瀚章。郭嵩燾曾稱讚毛鴻賓能消弭騷亂（8：424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日日記），事實上兩人極爲相得，所以毛鴻賓升任兩廣總督後，薦他爲廣東巡撫，冀得一賢下屬。至於他在廣東與毛鴻賓處不好，卻是兩人都未料及之事。

惲世臨撫楚時郭嵩燾在外省作官，不在湖南。他說惲世臨遭人彈劾去職，「楚人至今歌思之，兩次醵金資寄其家」，所以也是好官（9：452-453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記）。

李瀚章是李鴻章長兄，李氏六兄弟與他均早認識，他署廣東巡撫時，李瀚章是他屬下的廣東按察使與布政使，後陞任湖南巡撫。他卸粵撫返鄉，瀚章的任期還有半年多，惟他住湘陰，與瀚章很少見面，只有書信頻繁往來，日記中對瀚章在湖南的施政無一語涉及之。

李瀚章的下任便是劉崑，他對其甚爲失望，寫下很多責備語。[7] 其人除了晦蒙否塞，還識闇力柔，受到其任內兩位布政使李榕、王文韶強勢領導，下詳。

劉崑之後是王文韶、衛榮光（僅一月）、邵亨豫、李明墀、涂宗瀛、卞寶第。郭嵩燾有綜合評論，只嘉許李明墀：

> 自王夔石〔王文韶〕以來，更蒞五任，僅一李玉階〔李明墀〕稍能考求吏治，而苦其學識力量均有未足。王夔石之污私，邵汴生〔邵亨豫〕之昏庸，涂閬軒〔涂宗瀛，1812 年生，1881 年就任時 70 歲〕之耄荒而龐然自大、不察下情，皆無可與言治。卞誦臣〔卞寶第〕語言明爽，方冀其有所建白，而所行乃多拂人望。吏治民風，日趨日下，都不介意，而苛舉細故，以求逞志一二人。[8]

然而對李明墀亦曾評云：「於政要全未了然，以知其無能有所振興也。」（11：188 光緒五年十月初九日日記）諸撫中，王文韶尤爲他所歸罪者，亦見下文。

7　例如 9：450 同治九年閏十月廿四日、頁 470 同治十年三月十三日、頁 476 同治十年四月廿五日日記。

8　郭嵩燾又載陳三立見卞寶第後的評語：「所言虛浮無實，無適聽者，於洋務尤遠。」（12：104 光緒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日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卞寶第（第一任）之後的潘鼎新和龐際雲，「意見頗深」（12：17 光緒十年三月十六日日記）。潘鼎新署理期間，「湖南吏治之壞，一意苛擾百姓，縱官吏爲非，暴虐奸宄，通上下皆然，……獨在官者不悟」（11：601 光緒九年八月廿六日日記）。又謂龐際雲爲「末流之世乃有此人才」（12：17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日記），並記載了他以知縣缺交換某人捐銀八千兩，云：「紀綱掃地盡矣，此大亂之徵也。」（12：12 光緒十年二月廿二日日記）

邵友濂只任職半年，郭嵩燾未記其政事、評其人格。對張煦，記其不明洋務，聞盛宣懷要捐置內湖輪船二艘，「頗爲惶懼，謀設法止之」（12：452 光緒十六年四月廿三日日記）。張煦阻他求見，令他感慨「末流之氣運固然也」（12：470 光緒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日記）。「末流之世」是他對其時代的評定，氣運趨於人心風俗之壞，不是他或別人阻擋與逆轉得了的。次年六月十三日他即溘然長逝。

二、奸民

亂世之政的特色，是縱逸奸人而殘害良民。郭嵩燾認同朱熹之言，謂捉拿殺人大盜後放其生路，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他批評當時官場習氣之弊，其一是「巨奸大慝，有罪犯必矜恤之以乘其生」（8：431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五日日記）。故他由貓不善捕鼠，反「與群鼠耦居無猜」，比擬於「末流之世，官司失職，盜賊橫行」，人類和動物同一道理（9：370 同治八年四月廿三日日記）。於是惡氣受到助長，善氣受到消磨（8：372 咸豐十年十一月廿八日、頁 429-431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五日日記），天下氣運遂隳壞而不可支。

湖南省由治轉亂之機，在同治六年劉崑擔任巡撫起。劉崑爲主管軟弱，造成任內先後布政使李榕、王文韶強勢（例如 9：474 同治十年四月十五日日記），湖南人心風俗之壞，實由他們造成。李榕任內發生巨額金錢詐騙案，他包庇詐騙的錢店，由其他商人聯合代償。官府既然允許金融詐騙得逞，於是效尤者競起，吞噬他人皆數萬兩（11：230-231 光緒六年正月廿八日日記）。他另一次述及此事，評曰：「犯上無等，遂成風氣，朝廷紀綱，無復存者。」（11：166 光緒五年八月初九日日記）這種金額高的大案成爲指標，標示了湖南人的墮落。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文韶繼任布政使，所行的敝政爲放縱盜匪。盜匪是清代普遍的問題，郭嵩燾撫粵時，以清剿盜匪爲用力所在，戰績斐然。歿後李鴻章奏請國史館立傳與朝廷賜謚，特筆寫到這項成就（郭廷以，1971 年：1006）。王文韶所行相反，其不治盜賊的理由是以爲轄境無盜賊，名聲更優於剿清盜匪、綏靖地方。他不欲州縣以盜賊上聞，毋勞他發兵清鄉，也就無事需上奏朝廷，天下太平矣。結果兩人官運大不同，王文韶升上軍機處，他則灰頭土臉，革去署理廣東巡撫之職：

> 往時王湛園宰長沙〔同治十、十一年〕，鄉人捕送竊賊至，即釋之而給以錢，曰：「爾等徒爲飢寒所苦耳。」邑人相傳以爲怪，久乃知王夔石〔王文韶〕語州縣：「盜賊無辦法，萬不宜以上聞，爾等自銷而自理之可也。」於是州縣無治盜者。……湖南得王夔石釀亂十餘年，人心風俗乃眞不可問矣。吾在粵東，出示准士民攔輿越訴十條，第一條曰：「州縣諱盜爲竊，不收受民詞，或有抑勒者，准其攔輿。」與王夔石適得其反。鄙人被劾，而王夔石入值軍機，天下亦安得而不亂乎。（11：135 光緒五年五月廿八日日記）

郭嵩燾對於州縣官隱匿盜賊不報的對策是鼓勵人民舉發，王文韶則直是教州縣官以此做爲爲官、晉陞之道。王文韶的上級是巡撫劉崑，對民亂也一味消極（9：439-440 同治九年九月十三日日記）。他由是而追憶駱秉章、惲世臨兩巡撫求實際而不爲虛文，解決問題而不迴避，「懲治盜賊匪類尤力」，反觀王文韶則粉飾太平（11：160 光緒五年七月廿七日日記）。盜賊是惡氣，良民是正氣，王文韶之不作爲，是正氣、惡氣消長之機，其後劣吏接踵，惡氣更增，湖南人進入噩夢時代：

> 王夔石〔王文韶〕之釀亂亟矣，大端在銷磨正氣，專以縱庇盜賊爲心，此殆非偶然也。樾岑〔裴蔭森〕謂其明諭州縣不准報盜案，在善消弭之而已。此其爲弊極大。……得此十餘年之醞釀，而繼之以邵汴生〔湖南巡撫邵亨豫〕之昏庸，崇星陔〔湖南布政使崇福〕之貪污，是直蠲湖南而棄之矣。（11：119 光緒五年五月初二日日記）

氣是他用以解釋現實、聯結一切的理論，湖南的惡氣與天下的惡氣相連，人文的惡氣與自然的惡氣相連，所以一切都悲觀了。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看到湖南發生的大型案件，有巨額金融欺詐、山寇土匪、結眾施暴等三類，這在他省皆然。郭嵩燾著作所及的，還有山東、廣東人民搗毀釐局，毆打委派紳士致死的事件（汪榮祖，1993：77）。這是民氣太囂的現象，他認爲應該抑制。

三、紳士

咸豐九年正月廿四日郭嵩燾遞進〈謹推陳致治之原疏〉，帝當日覽摺後即行召見，問他還有什麼要補充，他奏言最重要的是瞭解民間實際情況：

> 今日總當以通下情爲第一義。王大臣去百姓太遠，事事隔絕，於民情軍情委曲不能盡知，如何處分得恰當？事事要考求一個實際，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爲急。（8：183 咸豐九年正月廿四日日記）

他對德國公使說中國需要的改革「尤以通民氣爲先」（10：609 光緒四年八月廿七日日記）。通下情的建議如何在中央政府實現，是他未曾解決的技術問題。不過在地方政治的層級，則通下情的意思很明白是重視紳士，他說：

> 通上下之情，以推知利病之實者，其紳士乎。今之有司，主內事者一幕友，主外事者一門丁，而疾視士紳如仇讎然。即稍知自愛者，亦染於積習，莫知其非，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8：477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

從他的日記可歸納出紳士的功用有四：一、官吏想知道地方情況、行政得失，以及預估政策利弊，可洽紳士諮詢。二、地方政府爲因應臨時需要而設置了各種局，需借重紳士擔任委員。三、紳士可以推薦人充任各種館缺。四、請紳士代撰文稿。對政治理論而言，第一種功用非常重要。

湖南在駱秉章、惲世臨治理時期親近士紳，既是因主政者的風格，也因抵禦太平天國的需要，官紳協力同心，終能以一省之力，平定東南大亂，贊成中興之業。惲世臨遭劾去職，湖南人兩次募款寄其家，也一定是因爲他撫楚時友好士紳，有以致之。太平天國亂平，劉崑任巡撫，李榕、王文韶任布政使，就轉爲敵視士紳，裁抑他們自軍興以來的驕氣：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吾楚自銅山張公〔張亮基〕、花縣駱公〔駱秉章〕任一省之力，肅清東南各省，以贊成中興之業，兩公聲名亦遂以照耀古今，豈能有異術哉？所恃通紳民之氣而已。陽湖惲公〔惲世臨〕爲倉少平〔倉景愉，字少坪，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二年任湖南按察使〕出死力擠之，罷官以去〔亦參全集第 9 冊頁 75 同治四年二月廿八日日記，云爲大理寺卿胡家玉中傷〕，楚人至今歌思之，兩次醵金資寄其家。數年以來，悉中外之人被湖南紳士以跋扈之名，相與嫉忌之。當事者至置吏治民風於不問，而專以裁抑紳士爲能。民氣阻遏，盜賊肆行，諸君名業，亦遂芬然無復可紀。孰得孰失，誰與辨之？自古亦豈有以阻塞紳士之氣爲能知政體者哉？翁玉甫〔翁同爵，同治五年署湖南按察使與湖南布政使〕、劉子迎〔劉達善，咸豐九年至同治元年湖南永州府祁陽知縣、長沙府湘鄉知縣〕倡爲此言，求壅閉紳民之氣以濟其私，吾楚在京諸公相與唱和之。「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語出《說苑・政理》〕吾不悲奸民從亂者之多，而深悲諸公挾私以求亂，爲禍鄉邦之酷也。(9：452-453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記，此年劉崑、王文韶在任)

郭嵩燾其實與李、王交情深厚，但是改變不了他們的成見（9：366-367 同治八年三月三十日、頁 466-467 同治十年二月廿七日、頁 537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七日日記）。

光緒五年他從英法返國，向湖南巡撫李玉階建言，仍以駱秉章「俯就」士紳爲典範（13：374〈致李玉階〉光緒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其後巡撫卞寶第「狂謬詭譎」（11：591 光緒九年七月初六日日記），以他爲標的人物而刻意打壓之（12：33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四日日記），並還惡意使他蒙受巨額金錢損失（11：602 光緒九年八月廿九日日記），他只能以蹇運自解，知天爲之而不怨天。

在他的想法裏，官方對盜匪和紳士的態度是反向的連動關係，姑息盜匪則猜忌紳士，倚重紳士則嚴懲盜匪，一個有害於地方百姓，另一個則有利：

> 因爲方伯〔湖南布政使王文韶〕極論吾楚所以治亂之由，以明駱〔駱秉章〕、惲〔惲世臨〕諸公之所以得，今之所以失。請移始息之仁，以施之百姓；而移所以猜忌紳士刻不能忘之隱，以施之土匪。其言極切，方伯亦爲之爽然自失也。蟄存〔姓周〕信云：「土匪開口便要殺官，官處處要屈抑紳士保全土匪。」此二語足爲寒心。(9：475 同治十年四月廿一日日記)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盜匪與紳士在官方心目中的地位升降，決定他們現實上的勢力消長，而這便是湖南省治亂的根源。

伍、西洋的印證

郭嵩燾奉派至英國擔任雲南教案謝罪大使，後改爲駐英公使，再兼駐法公使，從光緒二年十月自上海啓程，至五年三月返抵上海，對西洋政教民情、歷史文化做了親切的觀察與詳盡的記錄，即使坐輪船也不停學習。西洋的一切屢屢使他驚豔，認爲是三代與《周禮》的再現。以下分從五點來看他對西洋的講法。

一、氣運

中國的氣運衰蔽，西洋的氣運上升，若有轉移於其間。清朝鼎盛於乾隆之世，英國之發展則起於此時，清朝氣運迭迭日衰而不可挽，英國氣運臻臻日上而不可遏：

> 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強之業，實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創始乾隆，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1801 年〕，始用以行海內。又因其法創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1813 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吸鐵機器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1838 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1865 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與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1860 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才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13：271 光緒三年三月〈致李鴻章〉）

氣運涵括了全面的品質是好是壞，說英國的氣運好，便是說它各方面都好，以下四點是與政治最相關的。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朝局

清朝最高權力的運作，即見有兩種模式，一是皇帝積極領導，另一是首席軍機大臣積極領導。英國憲政也有這兩種模式，其發展從前一種變到後一種。

郭嵩燾認爲後一模式較好，因爲前一模式繫於君主一人之賢否，世襲制度下最多如周代文、武、成、康接連四世賢君，不能再長了，而後一模式將政權讓予臣庶，臣庶之賢能世世相替，推衍無窮。中國政治思想的公天下，是以公心治天下，這要視君主願不願意如此，西洋將政權公之於臣庶，則施政必公。從這兩個比較來看，後一模式有其長處：

> 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聖祖之仁聖，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無有能庶幾者。聖人以其一身爲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頗疑三代聖人之公天下，於此猶有歉者。(10：523-524 光緒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記)

這是憲政模式的思考，很多學者據以主張郭嵩燾先進於他人，已萌生改革政體的企慕。[9] 但是細究其說，優劣在於維持的長短，不在於聖人一人之

9　例如王興國認爲郭嵩燾傾向日、俄的君主立憲制，又謂他僅要保留皇帝，其他一切要向西方學習，改革中國，所以說：「我們千萬不要以爲郭嵩燾在西方轉了一圈回來之後得出結論，認爲還是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好（1998：216-218）。」
王興國以爲政體改革已入郭嵩燾心中，導致他曲解文獻。郭嵩燾對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詢以光緒帝親政之前中國有無改善可能，先答以：「中國律例不能違也。」(10：609-610 光緒四年八月廿七日日記）王興國以爲這句話指君主制不能改變，然而這是誤解「律例」一詞。律例是律和例，後者也稱爲例案，郭嵩燾以自己仕官的體認，主張奉行例案有助於治理，不可輕毀：

> 吾謂朝廷所以駕御天下，督撫所以駕御官民，一州一縣所以駕御數十百萬生民，無他，紀綱法度而已矣。今盡壞其紀綱法度，求以立國，難哉。

> 因言及例案。吾謂例案者，即所以控制天下之紀綱法度也。張江陵〔張居正〕相業非有他長，只是熟精例案。往歲曾為李申甫〔李榕，字申夫〕言，從前讀書無閱歷，隨人議論，例案繁多，使書吏得以高下其手，實為國之大蠹。迨後躬歷仕宦，始悟例案為患天下，在大小各官一無所事事，而倒授其權於書吏。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治與君民共治能分優劣。郭嵩燾從沒有認爲中國的中央政制可以仿效西洋的君主與議會共治，他是以「公天下」的觀念綜括了聖人一人統治與君民共治，然而「公天下」還不限於這兩種制度。清朝自道光帝以後，將權力讓給軍機處和六部行使，這可以說將政權公之於滿族子弟和科舉士大夫，然而治理日下之故，不在憲政體制，而在人才的多寡。

三、人才

政治權力托付給大臣行使以後，重要的便不在君德而在臣德。西洋的大臣與中國一般，需有貴族身分或某些資格，但是必任用賢能者，且必是國會與人民滿意的人員，不是君主或首相必欲誰任職就能任職的，與中國不同：

>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爲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10:376 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記)

進而言之，臣德之不墜又以民德爲前提，故郭嵩燾接著解釋西洋人養成誠實的文化，國會的辯論、庶人的上書都直接探求事實，不飾詐不隱避，所以參詳辯駁以後，能得到眞是非：

> 自始設立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於是兩黨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問難酬答，直輸其情，無有隱避，積之久而亦習爲風俗。

> 一省之大，出入各款，但一考求例案，歲省經費五六十萬誠亦無難。今人只是混混述去，即欲減省例案，上自宰相，下至從、未各官，果遂能研求其實，一無出入乎？吾自涉仕以來，未嘗敢一輕毀例案也。申甫不能體貼此語，只是粗才。(9：480 同治十年五月十四日日記)

這裏說紀綱法度就是例案，紀綱法度不指皇帝制度而言。關於以例案治國，可舉一例：援用引申例案以照顧傷廢的將弁，見 8：161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記。

其他凡是研究郭嵩燾憲政思想的學者，似皆主張他肯定西方君民兼主國政的政體，否定中國封建專制政體（洪岩，2009：8-10；張靜，2001：202；黎志剛，1984：522）。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其民人周旋，一從其實，不爲謙退辭讓之虛文。國家設立科條，尤務禁欺去僞。自幼受學，即以此立之程，使踐履一歸誠實。而又嚴爲刑禁，語言文字一有詐僞，皆以法治之，雖貴不貸。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深矣。世安有無政治教化而能成風俗者哉？西洋一隅爲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10：376-377 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記）

加上一切議論藉由報紙傳佈，所見的得失正誤得以周知社會上下，執政者資以考證，攻擊者資以責備，最後以輿論的向背決定去留：

>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報〔新聞報紙〕。議論得失，互相駁辨〔「辯」誤〕，皆資新報傳布。執政亦稍據其所言之得失以資考證……。所行或有違忤，議院群起攻之，則亦無以自立，故無敢有恣意妄爲者。當事任其成敗，而議論是非則一付之公論。《周禮》之訊群臣、訊萬民，亦此意也。（10：352 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記）

他稱讚西洋爲天地精英所聚之地，其中道理很明白，正氣必與誠實相應，惡氣必與僞詐相應，西洋既有深厚的良好民風，則天地正氣必也流聚於此。

他出使期間屢屢欣羨西洋人才之盛，其言論不勝枚舉，這裏只舉兩例，第一個是他對英國首相狄斯瑞里（Benjamin Disraeli）的崇讚。狄斯瑞里受封爲 Earl of Beaconsfield，所以他稱呼爲「畢根士非爾得」（與類似名字），他 1877 年 1 月抵英時狄斯瑞里剛過 72 歲生日，是第二次任首相，爲一資深老練的政治家。

1878 年 7 月歐洲各國爲了調解俄國、土耳其糾紛，召開柏林會議，英國援助土耳其，獲得外交大勝，他記載說：

> 群服畢根士之能。德人至環集會堂外，得一望見畢根士爲幸。（10：540 光緒四年六月初十日日記）

> 各國但驚駭其經營之秘，操縱之神，心羨妒之，而無能出一語相難。俄人雖懷憤憤不平之思，而固無如何也。畢根士於此亦可謂雄略矣。（10：540-541 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879 年 1 月 25 日，以卸任駐英公使職，往見狄斯瑞里辭行，狄斯瑞里與

他溫語甚款，他記述會談之語之後寫說：

> 畢根斯由爲英國名相，年七十餘，西洋各國相視以爲豪傑之才。而每與嵩燾言，未嘗不重視中國，以逮其使臣。此次情意拳拳，語長心重，不敢斷其爲誠心投契；而接其言論，領其意旨，使此心怦怦爲之感動。(11：3 光緒五年正月初四日日記)

第二個例子是德國，最高領導階層有皇帝威廉一世、丞相俾斯麥、將軍 Helmuth von Moltke、兵部尚書 Albrecht von Roon 四人，「富國強兵，皆此四人爲之」(10：111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日記)。郭嵩燾對中國的最高大臣說不出類似崇敬之語，反而是批評：「數十年居高位，乃無一有識者，此可歎耳。」(8：508 同治元年正月廿八日日記) 由此可知歐洲之強、中國之弱，其所由來矣。

四、國會議紳

英國國會議員，英文爲 Member of Parliament，簡稱 MP，沒有「紳士」字樣，而郭嵩燾稱爲議政院紳士、議紳、會紳，倒也符合十九世紀實情。上議院是貴族院，貴族不同於紳士，不過他有「上議院議紳」一詞 (10：528 光緒四年五月廿八日日記)。下議院議員中許多爲實業家、銀行家，的確是紳士，與二十世紀、本世紀的下議院議員以政治爲職業很不同。

歐美國會有議政、立法、決定預算、審查決算、進退官員之權，較之郭嵩燾官紳合作的構想只限於省府州縣，乃更爲先進。他瞭解議會政治的本質是令民權 (實爲紳權) 重於君權：

> 西洋政教以民爲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自議紳，民權常重於君。(10：484 光緒四年四月十八日日記)

然而議會中分爲政黨，爲何不會堅持意見，黨同伐異呢？這是因爲議員可以自由決定每個案子的立場，也即議員不受其政黨屬性之約束，這樣便每個議案就將全體議員分黨一次：「時因議一事而別分黨。」(10：677 光緒四年十一月廿一日日記) 這種情形至二十、本世紀亦然。所以每次投票的多數派、少數派之分都可以吻合事情的是非，國政永遠維持於正軌：「而每起一議，又准人數多寡以定行止，亦恰無甚顛倒者。」(10：425 光緒四年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月十日日記）

再者，兩黨意見相持，辯論爭勝，有益於指瑕匡正。郭嵩燾用「劑平」一詞，出自《左傳》晏嬰說，宰夫煮羹湯用調味料，味道不夠的再加，太足的予以降低，給君子喝時可以「平其心」。這可以比喻君臣，君主若對的意見中含有不對，臣指出其不對，以促成其對，而君主若不對的意見中有對，臣指出其對，而除去其不對，如此則施政也就「平」了。英國保守、自由兩黨的爭論，可以達到此效果：

> 大率當國者議論行事足以相服，則亦轉而從之〔謂在野黨議員可以支持執政黨，所以執政黨可以獲得多數票〕。其初各以其黨持議，幾於一成而不可易。蓋軍國大事一歸議院，隨聲附和，並爲一談，則弊滋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設爲朝黨〔Tory〕、野黨〔Whig〕，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劑之以平〔齊平、劑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後漢書・文苑傳・劉梁傳》〕），其由來亦久矣。（10：372 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

他對英國政治說得太美好，也有失實之虞，我將在最後一節討論。

五、民氣

中國有平民張汶祥刺死兩江總督馬新貽，西洋也有德國皇帝威廉一世、義大利國王 Humbert、西班牙國王 Alfonso XII、俄國總理巡捕提督 Nikolai Mezentsov、秘魯上議院議長與前總統 Manuel Pardo 遭刺，郭嵩燾評曰：「西洋犯上作亂視爲固常，由民氣太驕故也。」「歐洲民氣驕橫無忌，亦一奇也。」（10：511 光緒四年五月初六日、頁 577 光緒四年七月廿一日、頁 655-656 光緒四年十月廿五日日記。）

中國有市民鄉民搗毀釐局，毆打委員，德國有俾斯麥想抑制自由黨，而國會改選時自由黨仍然獲得選票支持，他評曰：「西洋民氣之昌如此，亦是一害。」（10：566 光緒四年七月初六日日記）

中國有市民鄉民抵制洋教士與洋人，拆房殺人，英國有 Bradford 地區織布機廠工人破壞工廠，燒廠主房屋，美國有鐵路工匠毀壞鐵路，他評曰：「蓋皆以工匠把持工價，動輒稱亂，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10：484 光緒四年四月十八日）

往好的方面看，民氣之昌是西洋進步的動力。孫訓華提出一個見解，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郭嵩燾從西洋聞見中得出一種新的民本思想，將人民從載舟之水提昇成引領國家與社會之舟前進的駕舟者（2005：57-58、61）。這個詮釋很可喜，然而孫訓華的文證沒有這個思想，我也找不到郭嵩燾有這個思想。他在西洋或許見到政治爲工商業服務，但他在思想上並沒有意識到。

陸、以心態為本

郭嵩燾以通曉洋務知名，出使英法是當年破天荒的機會讓中國士大夫到歐洲親歷其境，見其政教民風之彬美、學問工藝之精良。由於他對中外差距有了更強烈的體驗，返國後洋務觀點有了些微調整。例如他在英國時，致函李鴻章建議建設電報和鐵路，極有利於下情上達，縮短官民距離（13：274 光緒三年三月〈致李鴻章〉）。到了光緒六年，卻認爲「中國人心偷蔽已甚」，談什麼富強之術都沒有用，即使電報鐵路，無人心爲本亦無用（11：242-243 光緒六年二月廿六日日記，原爲黃嗣東〔字小魯〕語）。

又如光緒三年兩遞疏奏，請禁鴉片煙（4：808-810 光緒三年二月初八日《請禁止鴉片第一疏》、頁 819-823 六月初十日〈請禁鴉片煙第二疏〉），返國後卻認爲鴉片煙可禁於道光朝而不可禁於今（光緒朝），從前吸食者少，禁之而各省兵力足以防亂，今日吸食者多，「雖有嚴法竣刑，亦窮於爲用」，雖禁而「巧遁於法之外，無所顧忌」（11：199 光緒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頁 249 光緒六年三月十六日、頁 300 九月初一日日記）。「罌粟誠宜禁止，要非今日之急務也。」（11：617 光緒九年十月廿四日日記）

影響他對自強運動轉向消極與悲觀的原因，是他瞭解到西洋文明有其心態與精神爲基礎。因此相對於其他自強運動中人，他認爲他更知道「西洋立國之本」（11：146 光緒五年六月廿二日日記），此「本」是善良風氣、政教措施數十百年的累積：

> 凡爲富強，必有其本。人心風俗政教之積，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而求富強，果有當焉否耶？賢如幼帥〔兩江總督沈葆楨〕，於此亦未能深察也。（13：367〈復姚彥嘉〉，光緒五年四月）

他想，如果是康熙至乾隆的一百三十餘年，接上當前的洋務建設，才庶幾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希望。在人心風俗大敝之後，洗滌舊俗需要一百年，刮磨人才需要一百年，培養人才又需要一百年，中間需要主事者皆是聖人，共三百年才能有振興之望（11：236 光緒六年二月十三日日記）。又說：「人心風俗之積，聖賢相承一二百年，乃可與言此也。」（11：517 光緒八年九月初一日日記）

進而論善良風氣是什麼，也即「西洋政教風俗本源之所在」的「透頂第一義」、「國家政教之源，所以成乎人心風俗者」爲何（11：101-102 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九日、頁 113 四月十八日日記），則答案是不誠無物的誠，與講求實際的實：

> 中外大勢，一虛一實，一誠一僞，其不能相及，良有由矣。（11：249 光緒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記）

虛實誠僞，是最基本的態度與傾向，也是對待一切的出發點。他從中國西洋的比較而得出這四個字，合乎《中庸》的誠。中國背離聖人之教而西洋實行之，不本之於誠則萬事皆隳，本之於誠則萬事俱興。

但是日本沒有百年淳厚風俗，卻能傾心西洋，實行西法，他說：「吾觀其君臣之相爲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爲有本也。」（11：506 光緒八年三月初三日日記）如有誠心以講求實際，則政務不分內政與洋務，理該如何、事應如何，就應如何辦理。他錄余世松（字佐卿）之言：「辦理洋務不待遠求，能於吏治民生，清釐整飭，即洋務思過半矣。」（11：101 光緒五年閏三月十六日日記）他很同意這番見解，把此當做洋務的中策。上策是培植人心風俗，已如前述，下策是以理與外國人交涉，中策是把內政治理好，以同樣的精神則洋務也自治理好了：

> 其次則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循分自盡而已，則亦必求知所以循分自盡者爲何事，而行之何先。如今日吏治之瞀亂，欲無整飭，得乎？民生之凋弊，欲無存恤，得乎？吏事固必求理矣，民氣固必求通矣，朝廷持是以課之疆吏，疆吏持是以課之所司，欽欽焉求所以治國而理民，悉洋務一切廢罷不講，而洋務自理。何也？吾之所爲，誠有以服其心也。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也。（13：367〈復姚彥嘉〉，光緒五年四月）

此將內政與洋務合爲一談，總歸於求治理之道、盡治理之責而已。中國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不務考求實際，不察事理之安，內政既不能修，洋務亦不能舉：

> 吾謂吏治不修，不在州縣而在大吏，其源尤在當國之大臣。以此時天子幼沖，政在樞府，舉措刑賞所自出，惟當國者好尚喜怒所繫爲尤重也。今言者動曰取法西洋製造乃能致富強。人心風俗，政治法令，闒冗如此，從何取法西洋乎？於是益見中國求治之難也。（11：261 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日記）

他到了自強運動後半期，斷言運動無成效。

沒有善良的人心風俗，官吏自然沒有善政，茲舉郭嵩燾日記一例說明。一些紳士集資在湘潭縣開採煤礦，洽請招商局承售。招商局驗過認爲與洋煤品質相當，洋煤一石一元，向紳士議價爲一石四錢。比運至招商局，則司門者索規費一石廿四錢，匠頭亦廿四錢，過稱者十六錢，再加上各種雜費，一石至二百四十錢，賣出所得僅敷工本。此外煤廠工人每爲無賴需索，縣官黃教鎔（字子冶）輒相與助成其勢，詐索財物。於是役工千餘人，常停工至月餘，對股東損失很大（11：260-261 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日記）。開礦是工業的基礎，將舊資本引導去投資新事業是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必然法門，可是中國沒有良好的投資環境與體制，官民的惡習陋規掣肘資本家先鋒，則發展實業之途顛簸難行，富強之治遙遙無期。

西洋誠與實，中國僞與虛，特別顯著表現在滿清貴族與中國士大夫面對外國的虛驕之氣，對於來華通商傳教的外國人，總以避畏、激奮自處，以欺詐、蠻橫待之，而自曝其愚蠢，所以通商之局弄得兵戎相見，和平傳教變成命案謝罪。他錄曾國荃批評謀國者不誠無物，欲與外國和，卻「挾機心以相嘗試」；欲戰，卻不誠心備戰，所以危險（11：385-386 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日記）。此與他長年痛陳中國虛驕相一致。

有問題即應該改善，問題如果出在心態與習性，那便從此改起。鴉片煙是社會最大的弊害，他認爲需要教育抽煙者「發其愧恥之心」、「使人之心中省得」，使人民從內心不想抽，這才是對「本原之地」之地的做法（11：386 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頁 558 光緒九年二月十一日日記）。故他結合紳士朋友成立「禁煙公社」，每季一會申講其義，社員各自約束自己家族不吸鴉片煙，以此爲起點慢慢影響他人。他清查自己族內吸鴉片煙者，列出年逾五十者七人，居於外地應從緩者八人，已戒者三人，理應飭戒者七人，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送予《禁煙條規》一本與丸藥一封（11：181-182 光緒五年九月廿一日日記）。子弟有賃屋經營煙館者，令與懲處（11：136 光緒五年六月初二日日記）。社員李元度（字次青）在宗祠祭祀時告祖宗，言：「子孫不幸有吸食洋煙者，請陰殛之，俾世世子孫不復犯此。」（11：365 光緒七年三月廿六日日記）

他晚年居於長沙另一事業是思賢講舍，這是所學校，開館之初有十五位學生（11：365 光緒七年三月廿六日日記），但也舉辦眾紳半年一次的會講，兼有社團的性質。

禁煙公社與思賢講舍是他晚年寄望改善社會的兩個社團組織，兩者「相附麗」，以華中一隅由近及遠，由小推大，漸達全國，以及培養出新時代的菁英：

> 數十年來，確然知天下所以貧弱及人心風俗之日趨於澆薄，實起自鴉片煙。近來又實見學校之衰敝，關係尤巨。所以開設此兩局，由近及遠，由小推大，以待賢哲之興。要先使人知務本向學而已。（11：419 光緒七年九月初一日日記）

他不訴諸政治力量而採用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是察其「機」而杜塞其本原，不待嚴刑峻法而可成功，他節引程頤《周易程氏傳》曰：

> 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嚴刑峻法而惡自止也。（8：494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記，節引程頤《周易程氏傳》）

因爲本原在於內心，爲善去惡必須發自於人人之心，外在命令無法令其發生。具體之事如鴉片煙，一般的心態如虛驕之氣、私心、欺誑、愚蠢，都需用教育的方法，向人心著手（11：517 光緒八年九月初一日日記）。這樣做很緩慢，但這是唯一有效的辦法。

柒、不涉及改變政體

自強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階段，郭嵩燾是自強運動的一個人物，他將政治思想印證到西洋，而不受西洋而來的改變，這是個很有意義的地

臺灣期刊資料庫

方，該對此做些討論。

中國現代化的曲折過程中，有過四種現代化方案：

一、學習西洋的軍事與工業。

二、學習西洋的學校制度與學術，後者以科學爲主，然而實則包括一切學術。郭嵩燾的立場爲此，他批評洋務派不知洋務以學問爲本。後來「中體西用」的見解也屬於此種。

三、學習西洋的政治法律制度。

四、大程度放棄傳統文化，以西洋文化取而代之。

郭嵩燾不會採用第四種，因爲中學和西學對他而言可以結合，科學上中西相抵觸處以西學爲準，而程朱之學是修養心性的準繩，經學含有一切的大道理，這兩件也確不可移。至於他爲什麼不會接受第三種，則是我們最後想探討的。

他瞭解到政體有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種。法國、美國是民主，他見到民氣太強，等威陵夷，紀綱廢弛，不符合《周易》「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之教，以致政治弊病甚多（11：27-28 光緒五年二月初一日日記）。他聽法國商人對本國政治的評論，學到平等是不自然的，不平等才是自然的，政治的本質是發號施令，需要地位之不平等：

> 與刪布洛〔同船之法國人〕論法政議論紛紜，數年未定，近時更換伯理璽天德〔President〕，國是其稍定乎？答言：「未也。往時麥馬韓〔Patrice de MacMahon〕主兵日久，尚有威望。今克來威〔Jules Grévy〕起自議院，冠服如平民，人視之等耳，性情又和易，誠恐議論將日繁，日異月改，變更方未有已。」
>
> 問以宜如何而後可以安定國家？曰：「須強毅有斷制者壓伏一切。議論各屬民主，要須略存君主之意，而後人心定，國本乃以不搖。」因言泰西政教風俗可云美善，而民氣太囂，爲弊甚大。去年德國、意大里、西班牙屢有戕君謀逆之案，俄羅斯亦數傷斃大臣，亦是太西巨患。曰：「民主之意甚美，然須甚去兵、去刑罰，盡斯民而歸於仁善。如耶蘇立教，視人猶己，人人相忘於渾噩之天，乃爲無弊。而人心萬有不齊，其勢不能截然使之齊一。即人之一身有前後左右，而著力處尤在右手，即用法亦有參差，一手五指亦須是有長短。民主

臺灣期刊資料庫

> 立國，無分貴賤上下，強天下之不齊以使之齊，則將截中指以補小指，使體骨皆失其用，而虛爲一體同視之名，其勢恐萬難持久。」……似其爲言亦屬君黨，而理固莫能外。（11：24-25 光緒五年正月廿七日）

結論是民主之國需摻君主之用，例如總統極有威嚴或實力，否則國家久必顛危。

次論君民共主國，此即英國。前文說到郭嵩燾認爲紳士應該受到重視，而英國憲政制度讓紳士得議決法律、討論大政，組成內閣而執掌政柄，比中國更加先進，所以他應該嚮慕英國的議會內閣制，回到中國後予以提倡才是，可是他並沒有如此，其故爲何？

他有取於英國憲政制度之處，是它的「公」，意謂君主將權力交付給社會中的菁英來行使。這種「公」的辦法比聖君一心之公，諄諄以百姓爲念，要能行得更加久遠，這在前文已經見到。引進紳士進入中央政治結構，是實現此「公」的一法，但非唯一之法。漢朝廷議是百人以上的大會議，自六百石的議郎以上皆與會，人人意見平等，皇帝聽從眾議然後實行，這也是公天下的制度：

> 漢時國有大政，公卿會議，下逮議郎，皆可直攄所見，上贊軍國之至計，人主亦常屈群議而從之。言者不以爲囂，大臣不以爲忌，天子亦不以爲功，故以爲聽言之廣，後世無若漢者，惟其以實不以文也。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也。今之叔皮〔班彪〕不難其人，而能與朝廷之議者，曠世無由一見。人才何由而興，國政何由而善哉。（8：496-497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記）

菁英有哪些人，隨時代而變異。漢代還沒有紳士，所以將中級以上的京官集合辯論，就已經做到菁英參與了。

清代道、咸、同、光朝也是皇帝（含聽政的太后）交付出權力，從皇帝來說他們已經「公」了，可是討論和決策並沒做到「公」，原因是首席軍機大臣成爲唯一決策者，權力又變成另一種私有。他〈謹推陳治理之原〉疏陳述了軍機大臣與咸豐帝議事的情形，唯首席軍機大臣發言，其他軍機大臣皆緘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自頃軍機召對，惟班次首列者得陳奏上前，餘皆委蛇旅進，取充陪位。此非有隨班例奏之條，越職言事之譴也，而積久成習，莫敢逾越。國家大計取決俄頃之間，又以一人獨對，臣慮其無兼營之智，而多貽誤之舉也。(4：3 咸豐九年正月廿四日〈謹推陳致治之原疏〉)

此年首席軍機大臣是彭蘊章，郭嵩燾曾因個人的事對他不滿（8：293 咸豐十年三月十七日日記），而以咸豐朝之衰亂不振，指責其「多貽誤之舉」必非過嚴。同、光朝之肅順、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也就是那擁有最大權力（然權不專）之人，亦都不獲他好評。

同治四年起，慈禧太后開始提拔學識高深的官員來抑制恭親王，以他們的清議抵銷恭親王無視祖訓的傾向，官員開始知道恭親王不再總能邀得太后寵眷。慈禧太后也讓一切外交、防務事務，在反對洋務的諸王與官員共同參加的會議上討論，以削弱總理衙門（郭廷以，1985：545-546），這在形式上已是一種「公」。再者，清制，重大事項下百官與在外督撫各陳所見交部彙整，所以眾官的書面辯論是存在的，而若執政者詳察眾議然後決定，那也就「公」了。故郭嵩燾說咸豐以前政體不「公」尚可，同治以後便非如此了，然則清末決策問題出在那裏呢？稍前看到他以漢光武帝廷議上的的班彪自比，他這位清代班彪對外交政策方針反覆陳說了二、三十年，只與絕大多數士大夫主戰的意見相左，對清廷的和戰大計影響微乎其微。是以中國之不如外國，不在於政體之「公」不如外國，而在於人才的多寡與心態的虛驕或平實。他與相反的政見奮鬬半輩子，得到的教訓是現在爭不贏，只能以學校教育知識，以社團教化人心，這樣尚能爭三百年以後的未來。

如此看來，他對英國的欣賞便稍有理由之錯誤。他讚美英國「闊大，一切包羅孕育之」(10：704 光緒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記)，其實他在英、法待僅兩年，時間不夠長，對英國政治過程的認識還不夠多。英國國會的政黨政治、議員發言，結果不見得都是明智的。他日記不太記錄到這一面，但偶爾有之，如這條：

> 安友會〔Society of Friends〕人卜來得與科布敦同詣議院之持異議者，囑阻止俄、土用兵之議。……及見，格蘭非爾〔上議院在野之自由黨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領袖 Earl Granville〕曉之曰：「吾意不樂用兵與君同，雖然，言之無益也。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用兵中國，兩議院爭持甚力，議紳波爾克畢得〔疑爲 George Brooke-Pechell，自由黨〕竟至請散會堂，戛然而去。其時議請不用兵者，人數多於用兵者，然終不能相勝。吾在議院久，國家定計用兵而能匡正者，實亦無幾，況其於國事本有關係者乎？」（10：448-449 光緒四年三月初四日日記）

這裏談到 1857 年的往事，與中國很有關係，那就是第一次英法聯軍。事件肇始是亞羅號（Arrow）船到底有無走私，與廣州官方有無侮辱英國國旗，英國國會爲此激辯，首相是自由黨的 Lord Palmerston，主張對中國強硬，然而國會激烈批評政府的道德性，抨擊最力者是其同黨 Richard Cobden 和 William Gladstone（後來四任首相）。Lord Palmerston 反擊方式是煽動愛國心，謂 Cobden 展現「反英國的情緒，我很難想到本院議員口中會流出這種東西。英國的每件事都錯，而與英國爲敵的每件事都對。」又說如果通過譴責案，就表示下議院投票「放棄地球極遠方的一大群英國子民，任由一幫野蠻人宰制，一幫虜掠、殺人、毒死人的野蠻人」。3 月 3 日下議院以 16 票之差通過譴責案，4 月舉行大選，自由黨席位更增，表示全體選民推翻了譴責案，Lord Palmerston 當然續任首相，也就對中國用兵，終於演成第一次英法聯軍（Wikipedia, N. d.）。

郭嵩燾記敘了 Earl Granville 追述 1857 年的議會黨爭，但並沒有像我這樣將往事追索出來。如果他做了，他應不會無保留讚美英國政治是理性、合理的。1857 年關於中英外交問題的政爭，可以證明政治的好壞與政體做爲君民共治的議會內閣制並無關係，也證明兩黨競爭未必能「劑平」而制成合理中道的政策。政治的好壞、政策的當否、吏治的良窳，誕生自人的觀念想法，私心猖則蔽，公心勝則王。

郭嵩燾沒有由於欣羨英國而主張改革中國憲政體制，他寄望光緒帝親政，將政治拉向正軌，其理由我們已可理解了。他身後七年的百日維新，應驗了他在政體不變下大幅變法的預言。只是其後一連串的變故，與日俄強鄰侵略的威脅，亡國陰影蒙上國人心頭，促使政治改革排上了中國現代化的日程，君主立憲與革命的論爭焦點就在政體，和他看不出中國政體需要改革的想法大異其趣了。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捌、結論

郭嵩燾去世前一年還批評湖南省的政治、士習、民風淪喪敗壞，足以釀亂，令他危懼：

> 自省城十餘人〔「年」誤〕所見，時政吏治，民情風俗，皆足爲亂階，無日不懷危懼。[10]

中國雖有外患，他的時代感受卻是中國的內憂大於外患，西方文明國家志在通商和傳教，不在侵略，反而中國吏治敗壞、民心不古，才是亡國的勢。所謂氣運從中國轉移到西洋，不在於爭富鬬強，而在於治理與風俗人心的良善與否，關於這一點，時代思潮研究（如王爾敏之文）無法揭示，而本文則致力作系統的展現。

他的政治思想承襲中國傳統見解，包括政治權力在宇宙中心、外王本於內聖、天人感應、氣的同性加乘、注重吏治等等。出使歐洲擴大他的見聞，影響他認爲自強運動無法收效，中西差異的根本在於人心風俗。他不符合林毓生所說的以文化、智識改革優先於制度政策措施，而是有鑒於中國最低落的就是人心風俗，故思欲從心態救起。

他處在統治階層驕滿虛僞的時代，無可行使政治權力匡正人心，迫使他從事於一地之親族友朋的改良。他結束仕途後，舉辦社團和私立學校，既是本於儒家思想，也稟承宋代以來人民組織社團的興旺傳統（Gernet 著，何高濟譯，2004：46-51），以及受了英、法國社團蓬勃發展的啓發。他明知成效微而收效緩，但本著時代良心，毅然投身去做。

他感覺很難掀動的人心觀念，在他去世四年後，因甲午戰敗而受到巨大刺激。中國厄運再加深，有一半的人主張更大革新，而另一半的人繼續保守自大，對西方列強和西方文化的勢力愈加敵視。這兩種傾向在戊戌變法和庚子拳亂分別達到了極致，後者一敗塗地，令前者成爲唯一的潮流，然後又分化爲政體改革的溫和與激進兩派。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10] 12：488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日記。《清史稿》的評語與郭嵩燾完全相反，說光緒初期的吏治比較好（趙爾巽等，1981：12571-12572，卷 451）。

君主立憲與革命民權之爭，後來有了結果，這個結果再經過幾次嬗遞，穩定成爲海峽兩岸兩個政體。一百多年間，國人常以爲政體問題至上，改革了政體則一切都可上軌道，然而實際證明並非如此。郭嵩燾所說的人心風俗，依然是一切政體能運作良好的前提。今世大儒余英時經常關心臺灣的民主品質，而所建言，不是營造理性對話空間、增進公民參與之類，卻是提升人文素養（顏擇雅，2022：6）。前賢後賢，所持要領一也。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Gernet, J. 著，何高濟譯，2004，《中國人的智慧》，上海：上海古籍。譯自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Paris: Gallimard. 1994. Gernet, Jacques. Ho Gaoji. trans. 2004. *Zhongguoren de zhihui*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Translated from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Paris: Gallimard. 1994.

王爾敏，2003，《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Wang, Er-min. 2003. *Zhongguo jindai sixiang shilun* [*O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王興國，1998，《郭嵩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Wang, Xing-guo. 1998. *Guosongtao pingzhua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Guo Songtao*].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汪榮祖，1993，《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Wang, Rong-zu. 1993. *Zuoxiang shijie de cuozhe: guoshongtao yu daoxiantongguang shidai* [*Frustration of Moving towards the World: Guo Songtao and the Daoguang, Xianfeng,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s*]. Taipei: Dongda Publishing.

洪　岩，2009，〈郭嵩燾的憲政思想及其評價〉，《遼寧警專學報》，11: 8-10。Hong, Yan. 2009. "Guosongao de xiangzheng sixiang ji qi pingjia" [The Introduction and Evalution on Guo Songtao'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dea]. *Journal of Liaoning Police College* 11: 8-10.

孫訓華，2005，〈郭嵩燾「君民維繫」思想探析〉，《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2(4): 57-58、61。Sun, Xun-hua. 2008. “Guosongtao junmin weixi sixiang tanxi” [Exploration of Guo Songtao’s Idea of Connecting the Ruler and the People]. *Journal of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12: 57-58, 61.

班　固，1986，《漢書》，臺北：鼎文。Ban, Gu. 1986. *Hanshu*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Taipei: Dingwen Publishing.

張　靜，2001，《郭嵩燾思想文化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Zhang, Jing. 2001. *Guosongtao sixiang wenhua yanjiu* [*A Study on Guo Songtao’s Thought and Culture*].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張晨怡，2007，《清咸同年間湖湘理學群體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Zhang, Chen-yi. 2007. *Qing xiantongnienjian huxiang lixue qunti yanjiu* [*A Study on the Group of Li Learning in Hunan in the Reign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郭廷以，1971，《郭嵩燾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Guo, Ting-yi. 1971. *Guosongtao xianshen nianpu* [*Chronicle of Mr. Guo Songtao*].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郭廷以，1985，〈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531-583。Guo, Ting-yi. 1985. “Ziqian yundong: xunqiu xifang de jishu”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In Search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Jianqiao zhongguo wanqing shi 1800-191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eds. John B. Fairbank, Jr. & Kwang-Ching Li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531-583.

郭嵩燾，2012，《郭嵩燾全集》，長沙：嶽麓。Guo Songtao. 2012. *Guosongtao quan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uo Songtao*]. Changsha: Hunan Yuelu Publishing House.

趙爾巽等，1981，《清史稿》，臺北：鼎文。Zhou Erxun et al. 1981. *Qingshi gao* [*Draft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Dingwen Publishing.

黎志剛，1984，〈郭嵩燾的經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509-530。Li, Zhi-gang. 1984. “Guosongtao de jingshi sixiang” [Guo Songtao’s Thought on Statecraft]. In *Jinshi zhougguo jingshi sixiang yantaohui lunwenji* [Conference Papers on the Thought of Statecraft in Late China], ed.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Institute of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509-530.

黎澤濟，1988，〈郭嵩燾和肅順的關係：對《清史稿》的一點質疑〉，《學術月刊》，9：無頁碼。Li, Ze-ji. 1988. “Guosongtao he sushu de guanxi: dui qingshigao de yidan zhiy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o Songtao and Sushu: A Questioning to *The Draft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cademic Monthly* 9: n. page.

顏擇雅，2022，〈導讀：給台灣的最後建言〉，顏擇雅（編），《人文與民主》（余英時著，全新編輯校對版），臺北：時報，頁 3-8。Yen, Ze-ya. 2022. “Daodu: gei Taiwan de zuihou jianyan [Introduction: Final Advice to Taiwan]. In *Renwen yu minzhu* [*Humanity and Democracy*], ed. Yen, Ze-ya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3-8.

二、西文部分

Schwartz, B. I. 1996.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kipedia. N. d. “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John_Temple,_3rd_Viscount_Palmerston#Arrow_controversy_and_the_Second_Opium_War. Latest update 12 September 201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uo Songtao*

*Kang Chan***

Abstract

For Guo Sontao, the rule of a sage-king or of a worthy prime minister is good, but the goodness of "an empire open to all" is more enduring. Constitutions that are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onfirm his evaluation. "An empire open to all" in China means including more officials in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bestows the local gentry with access to local administration, while its meaning in the Western principalities is to relegate power to an elected gentry and a hereditary aristocracy.

Since both the rule of one person and "an empire open to all" could be good, the source of bad governance lies elsewhere. An emperor, a prime minister, a governor-general, a governor, officials in a collectivity, and aristocrats and gentry in a collectivity all would rule poorly if they do not study science and investigate reality.

The attention to or the disregard of facts and reason can consolidate into good or bad *qi* nationwide,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qi* of the whole world. The decline of China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took place after the year 1800,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effects of people responding to the flow of *qi,* as the power of nations shifted between the two hemispheres.

With China dominated by bad *qi*, Guo retired at the age of 61 and founded a local society and a school in Changsha, aiming to refine human minds. Despite being a scholar-official facing scandals, he contributed his private efforts to improving a corner of China, the renewal of which in his estimate would take three hundred years to complete.

Key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Late Qing Dynasty,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

* DOI:10.6166/TJPS.202309_(97).0001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kangchan@nccu.edu.tw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